

先秦至汉晋时期云贵地区 北盘江流域的农业变迁与族群迁徙*

张 勇 汤红豆

摘要:先秦至汉晋时期贵州高原西部的北盘江流域的原始农业发生重大变迁,根据生产工具、技术、粮食作物品种等方面的变化,农业变迁过程可以分为新石器时代中期至商周、战国至西汉、东汉至两晋南朝时期三个阶段。造成变迁的主要原因是战国至两晋南朝时期滇人和汉人移民的两次迁徙带来先进的农具和技术,北盘江流域的原始农业进入锄耕阶段,而且出现了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但是,先进农业方式没有在北盘江流域普及,当地维持了多元生计方式和农业生产模式并存的局面。

关键词:北盘江;农业变迁;族群迁徙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24)01-0038-09

Agricultural Changes and Ethnic Migration in the Beipan River Basin of Yunnan– Guizhou Region from the Pre-Qin to Han and Jin Dynasties

Zhang Yong, Tang Hongdou

Abstract: From the pre-Qin to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the primitive agriculture of the Beipan River basin i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Guizhou Plateau underwent major changes, and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chang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in production tools, technology, and variety of food crop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change was that the two migrations of Dian and Han immigrant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East Jin, West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rought advanced agricultural tools and technology, and the primitive agriculture in the Beipan River basin entered the stage of farming with hoes and ploughs, and the production mode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ppeared. However, advanced agricultural methods did not spread in the Beipan River basin, and the local area maintained a situation where multiple means of livelihood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atterns coexisted.

Key words: Beipan River basin; agricultural change; ethnic migration

北盘江是珠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云南省沾益县(治今曲靖市沾益区),流经贵州省西部,在黔桂边界汇入红水河。学界一般认为,北盘江是汉代的牂柯江^{[1](P111)}。西汉司马迁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可行船。”^{[2](卷116《西南夷列传》,P2991,P2994)}战国秦汉时期北盘江两岸生活着以夜郎为主的众多族群。目前学界多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夜郎地区已发展到以定居农耕为

张勇,男,历史学博士,贵州省六盘水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考古与西南地区古代历史;汤红豆,女,贵州民族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南民族考古。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古学研究”(项目编号:LSYZD21018);2021年度贵州省社科联理论创新课题“先秦至汉晋时期北盘江两岸的生业经济”(项目编号:GZLCLH-2021-220)。

主要社会经济活动的阶段^①,但是研究者对于夜郎地区农耕方式、生产工具、粮食作物品种、农业变迁过程等问题未作深入探讨。本文结合考古出土材料、历史文献与民族志资料,探讨北盘江流域夜郎地区农业变迁及其历史动因。

一、从原始农业演变到传统农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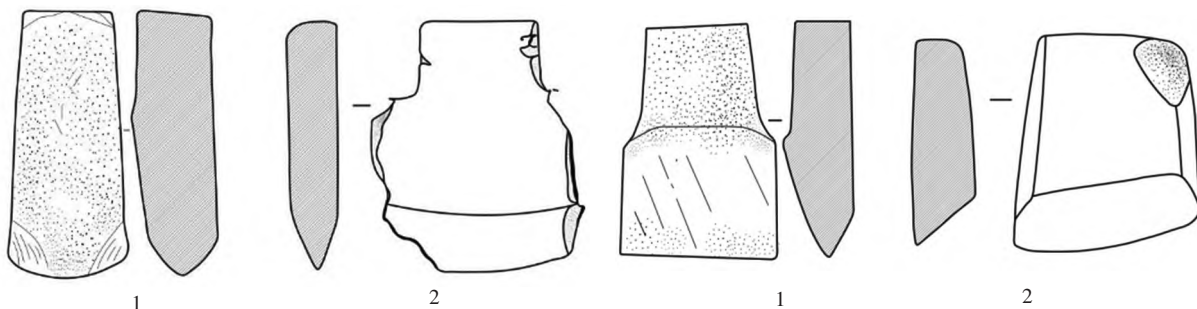
北盘江流域近年来发掘的一些早期遗址出土了若干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和相关遗存。不同类型的工具代表着不同的农业耕作方式和技术,根据生产工具、技术和作物品种的变化,本文将先秦至汉晋时期北盘江流域的农业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由于贵州高原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就出现原始农业^{[3](P51)},考虑到学术研究的完整性,本文将时代上限上延至新石器时代中期。

(一)新石器时代中期至商周时期

1.石器工具和刀耕火种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遗址有宣威尖角洞^{[4](P12-15)}、贞丰孔明河^{[5](P118-124)}、拉它遗址(6)层^{[6](P11-18)}。这些遗址出土了数量不等的石斧(图1)、石铤(图2)、石刀(图3)等磨制石器。学界一般认为石斧、石铤等工具是先民从事原始农业所使用的砍伐类农具^②。先民把树木砍倒晒干,烧成灰后开始播种,等作物成熟时再来收割,中间没有其他生产环节。土地一般种1年就要丢荒,另择其他林地砍烧,这就是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这种方法只需要用到砍伐类工具和点种棒等。在金属工具出现之前,人们能使用的砍伐工具只有石斧、石铤等石器。从民族志看,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民族居民也是使用石器来生产,如云南碧江县怒族群众开始种火山地(即刀耕火种的林地)时没有铁刀,就用磨制的石斧砍树;贡山县的独龙族早先也使用石斧、石刀为生产工具^{[7](P7-20)}。

竹木器也可应用在农业生产中,从事刀耕火种的一些民族会用小木锄点种、除草、松土^{[7](P19)}。不过刀耕火种生产方式的技术核心在于砍烧林地,翻挖、修整土地不是生产重点,所以砍树伐木用的石



1.尖角洞采集,引自《云南宣威县尖角洞遗址调查》图一:1;2.贞丰拉它T10(6):1,引自《贵州贞丰县拉它先秦时期遗址发掘简报》图九:8。

图1 早期石斧

1.尖角洞采集,引自《云南宣威县尖角洞遗址调查》图一:4;2.贞丰拉它T1(6):1,引自《贵州贞丰县拉它先秦时期遗址发掘简报》图九:1。

图2 早期石铤



1.尖角洞采集,引自《云南宣威县尖角洞遗址调查》图一:3;2.鸡公山遗址K97:2,引自《贵州考古出土文物精粹》第61页。

图3 早期石刀

斧、石铤才代表了处于原始农业初级阶段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

2. 粮食作物

目前各遗址中尚未发现有关粮食作物的遗存,对于这一地区早期栽培的粮食作物缺乏直接考古学材料。不过,从相邻地区出土的稻类遗存和民族志资料可以略窥一斑。

贵州威宁中水鸡公山、吴家大坪等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稻谷遗存。云南曲靖珠街乡扁窟洞遗址出土碳化稻,经检测为商周时期人工栽培的粳稻^③。这暗示了贵州高原西部及滇东地区在早期曾栽培稻类作物。

我国南方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在原始农业发展初期也曾栽培过稻类作物。云南西盟佤族最早栽培的就是旱谷和小红米^{[7](P141)}。20世纪90年代云南金平县的莽人在早期刀耕火种地里种植的粮食作物主要有旱稻、块根、块茎类作物及玉米。玉米是晚期才传入的,他们的原始农业发生时,在山地环境里能种植的只有旱稻和块根、块茎类作物^{[8](P130)}。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如怒族、景颇族等,早期农业也是从栽培块根、块茎类作物开始的。结合上述考古出土材料看,新石器时代中期到商周时期,贵州高原西部包括北盘江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区,土著居民种植的粮食作物可能包括了稻类作物和块根、块茎类作物。至于是否还有其他品种,这需要今后在田野发掘中加强植物考古的工作以获取相关信息。

3. 收获工具和收割方式

在宣威尖角洞遗址采集到一件穿孔石刀(图3-1),贞丰孔明河遗址出土一些只磨制边缘的小型磨刃石片,它们可能是原始农业的主要收获工具。在南方地区,一些少数民族最初是采用手拔或摘穗方式收获作物,摘穗时就要用到像竹刀、小刀之类的工具^{[7](P146)}。这种方式在近现代的一些民族中也常见,如贵州从江县加勉乡苗族在收割糯谷、小米、红稗等作物时使用摘刀。即便当地已普及了铁镰,但苗族群众仍然习惯使用这类工具^{[9](P20)}。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各类石刀和小型磨刃石片的功能应当与苗族群众的摘刀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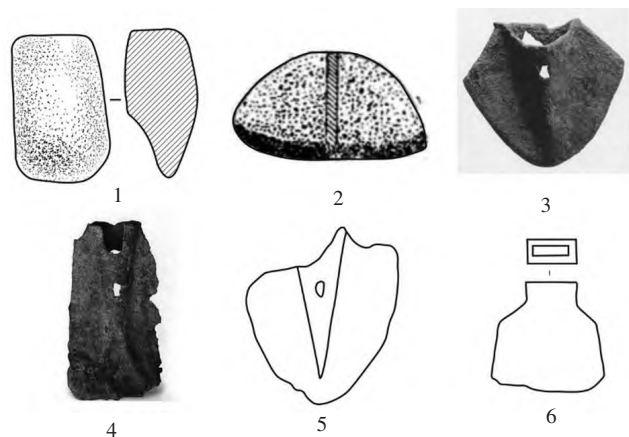
(二) 战国至西汉时期

这一时期分布在北盘江流域的遗址和墓地数量很多,其中代表性的有普安铜鼓山^④、兴义阿红^{[10](P124-127)}、云南宣威苏家坡和朱屯村^{[11](P95-96)}等遗址和墓地。出土的农业工具仍然以石斧、石铤、石刀等石器为主,表明刀耕农业仍在延续,但是也出现了铜器和铁器农具,反映出当地原始农业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 铜、铁制农具和锄耕农业

宣威朱屯村战国时期墓葬出土了一件青铜锄(图4-5),其外观呈尖叶形。附近苏家坡村西汉晚期墓葬出土一件铁锄(图4-6,原报告判断为铁斧,应是锄)和一件铁斧。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一件青铜镢(图4-3)。此外,近若干年来人们在北盘江西岸的盘县(治今盘州市)、兴义等地征集或采集到一些青铜锄和镢^{[12](P176-177)}(图4-2,图4-4)。

由于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每一年都要



注:1.石斧,普安铜鼓山T48:1;2.石刀,普安铜鼓山T12:16;3.铜镢,普安铜鼓山出土;4.铜锄,赫章可乐M189:1;5.铜锄,宣威朱屯村出土;6.铁锄,宣威苏家坡村出土。1与2分别引自《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第67页图六:1,第68页图六:3;3引自《2002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48页;4引自《贵州考古出土文物精粹》第97页;5与6均引自《云南宣威市发现青铜器等文物》图2。

图4 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石器及铜、铁制农具

轮换林地。随着人口增加和林地减少,势必要增加同一块土地的使用年限。如果要在刀耕过的同一块土地上继续耕作,人们就要在播种前翻土或松土,这时就要用到锄、耨、铲、锹等用于翻土的农具。因此原始农业在刀耕阶段之后就进入到锄耕阶段。这一阶段生产技术的重点是经营土地,由于长期在半固定或固定的土地上耕作,所以人们的社会生活进入相对定居的状态。

刀耕火种的土地隔若干年后转入固定或半固定土地耕作的情况,在近代一些南方山地民族中可以观察到。如云南傣族的耕地制度经历了从刀耕火种的游歇地,到用锄头挖的半固定耕地,再到用牛耕的固定耕地的变化过程^{[13](P92)}。又如西盟佤族马散寨村民开始从事农业时采用刀耕火种,后来人口增加和土地不足,他们才开始耕地,发展出锄挖地和牛犁地^{[7](P3)}。

北盘江流域出土或采集到的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铜锄、耨反映出这一时期土著居民在经营原始农业时开始对土地进行翻土耕作,甚至可能有中耕、锄草等田间管理环节。一旦对土地开展长期耕作和经营,人们的生活也转入相对安定的定居农耕阶段。近年来,北盘江流域的水城、盘县(治今盘州市)、六枝^[14]、普安^{[15](P291-294)}、安龙^{[10](P128-129)}等区县境内调查发现,发掘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遗址,其中包括洞穴、岩厦、山地旷野等类型,显示出各小地理单元内有规模不等的人群在这一区域内居住活动并形成大小不一的聚落或邑聚。文献上也有相应的记载,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夜郎等部族“耕田,有邑聚”^{[2](卷116《西南夷列传》,P2991)}。《汉书》中记载西汉晚期夜郎王兴拜见地方官员牂柯太守陈立时,“从邑君数十人入见立”,兴被杀后,“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收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16](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P3845)}。可见夜郎等部族当时已有众多邑聚。结合出土的翻土农具和上述民族志,可以认为,战国至西汉时期北盘江流域已出现锄耕农业。但是需注意,传统的刀耕火种原始农业仍在延续。

此外,西汉中晚期汉王朝开拓西南夷,大批汉人移民进入云贵高原开垦土地。他们带来铁农具和先进生产技术,前述宣威苏家坡西汉晚期墓葬出土的铁锄在形制上属于汉式器物,显然是外来汉人移民的农具。他们从事的农业已经是传统农业,使用的农具有锄、犁等,但目前相关证据比较稀少,暂不讨论。

2. 粮食作物

目前,北盘江流域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尚未报道有关植物遗存的情况,只有零星的相关线索。如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的陶支子上面夹杂有稻草^{[17](P61-64)},这暗示当地在战国至西汉时期曾种植稻类作物^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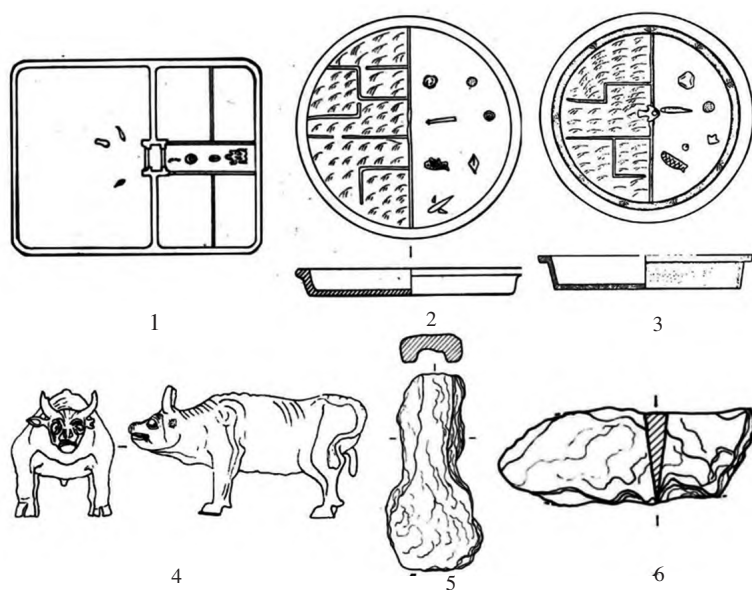
除了稻类作物外,可能还有粟类作物。西汉晚期夜郎王被杀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16](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P3845)}。钩町与漏卧两部族的活动区域与夜郎等族所在北盘江流域相邻,故推知当时的夜郎民众可能也种植粟类作物。

近现代当地一些少数民族种植的粮食作物仍以稻、粟为主,如贵州从江县加勉乡苗族在20世纪50、60年代处于锄耕农业阶段。当地群众种植的粮食作物就有糯谷、小米(粟)、红稗、红薯、芋头、玉米等^{[9](P26-37)}。其中仅玉米属于晚期传入的作物,反映出加勉苗族种植的稻粟等作物品种与两千年前北盘江畔夜郎等族群种植的粮食品种是一样的。云南地区西盟佤族、独龙族早期种植的作物有芋、旱谷、小红米、稗子、鸡脚稗等^{[7](P139)}。可见稻粟等小粒禾谷类作物在少数民族的原始农业阶段种植比较普遍。

值得注意的是,加勉苗族群众种植的粮食还有薯、芋等块根、块茎类作物,上述云南佤族和独龙族在早期也种植芋。虽然在考古出土遗存中不见这类作物痕迹,但可以认为,战国至西汉时期北盘江流域的居民仍然延续了先秦时期种植块根、块茎类作物的习惯。

3. 收获工具和方式

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了多件穿孔石刀。由于这一时期刀耕火种的农业还存在,使用石刀以摘穗方式收割谷物的习惯也延续下来了。除此之外,北盘江流域居民可能还使用爪镰和镰刀,因为外来族群的流动带来很多工具和技术,其中应有铜器和铁器收割工具,只是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线索。



1.陶陂池稻田模型,兴仁M6:45;2.陶陂池稻田模型,兴仁M7:12;3.陶陂池稻田模型,兴义M8:32;4.陶牛,兴仁M19:23;5.铁刀,镇宁05ZTT20④;6.铁铲,镇宁05ZTT9③;2。1与2引自《贵州考古四十年》第246页,图十:1、2;3引自《贵州兴义、兴仁汉墓》图一七;4引自《贵州兴仁县十九号汉墓》图六:3;5与6引自《贵州董箐考古发掘报告》第100页,图一〇〇:4,第103页,图一〇四:3。

图5 东汉至两晋南朝时期的陶模型器和铁制工具

(三)东汉至两晋南朝时期

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墓地和遗址有兴义、兴仁汉墓群^⑥和贞丰董箐遗址^⑦。汉墓的时代主要为东汉中期,出土物有陶陂池稻田、陶牛俑等模型器和铁刀、削等工具;董箐遗址的主体年代在东汉和两晋南朝时期^⑧,出土铁制工具有铲、刀、削、斧、镰刀等。出土的陶质模型器(图5-1、图5-2、图5-3、图5-4)和铁器工具(图5-5、图5-6)揭示出当地农业生产的工具和技术出现了新变化。

1.犁耕农业和水利灌溉技术

兴义、兴仁汉墓出土了3件陶陂池稻田模型器和1件陶牛俑。陂池稻田模型器由象征陂池和稻田的两部分组成,其间有水渠、水闸、过水涵洞等灌溉设施相连通。稻田部分被划分成整齐的小块区域,田块中刻画出行列整齐的秧苗形象,表现出稻秧生长的情形。陂池中则捏塑各种水生动物形象。稻田部分的秧苗形象表明农民使用了育秧移栽、行播等先进技术,而陂池、水渠、水闸、涵洞等灌溉设施和技术也是来自中原等汉文化地区先进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这几件模型器反映的是与中原地区相似的传统稻作农业生产模式。

兴仁19号汉墓出土的陶牛,牛身壮硕,四足结实有力,似乎为水牛。结合上述陂池稻田模型器,陶牛极有可能为耕牛形象,说明当地汉人居民已经使用牛耕技术。虽然墓地和遗址出土工具中没有发现犁铧等农具,但从墓葬出土大量铁器以及人们掌握了牛耕技术来推断,当时可能有犁铧了。董箐遗址出土的铁铲则表明当地至少已经发展到锄耕农业了。

上述出土的陶模型器和铁农具反映出东汉至两晋南朝时期北盘江流域部分山间盆地和河谷槽区已经出现了与中原地区相似的农业生产模式。这代表着当地农业开始向传统农业演化。当然这个过程是局部的,变化十分缓慢,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仍然大量存在。直到东晋时,牂柯郡的农业生产还

很落后,《华阳国志》描述为“畚山为田,无蚕桑”^[18](卷4《南中志》,P378)。上述墓地和遗址出土的铁农具不多,反映出汉晋南朝时期北盘江流域的农业结构比较复杂,即刀耕及锄耕的原始农耕方式与犁耕方式并存,原始农业和传统农业共生。

2. 粮食作物

虽然目前暂未发现这一时期的出土植物遗存,但是从西汉和唐代前后两个时期的作物种类大致可以做一些推断。前述西汉时期当地已种植稻、粟作物。至唐代云贵高原仍然在种植稻和粟,史载“牂牁蛮……土气郁热,多霖雨。稻粟再熟”^[19](卷197《南蛮西南蛮列传》,P5276)。唐代樊绰记录曲靖盆地以南及滇池西部的作物种植情况:“土俗惟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冈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20](卷7《云南管内物产》,P256)可见云贵高原腹地至晚在唐代已种植稻、粟、麻、豆、黍、稷、麦等作物。汉晋南朝时期与唐代相隔不远,北盘江流域与曲靖盆地所在的南盘江流域相邻,故可推知汉晋南朝时期北盘江流域也种植上述粮食作物。

3. 收割工具

董箐遗址出土的铁镰,说明此时期当地居民可能使用镰刀收割谷物,这是来自中原、巴蜀等汉文化地区的生产工具,反映出汉文化已经渗透到北盘江畔。虽然不见爪镰、摘刀之类的工具出土,但结合上引民族志资料观察,用摘穗方式收割谷物的做法可能还存在。

二、族群迁徙带来先进工具和技术

北盘江流域从原始农业发展到锄耕农业,之后又出现传统农业,这个变迁发生在战国至汉晋时期。其标志是铜、铁翻土工具应用于生产和农业定居聚落出现,生产工具和技术的革新在这个变化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而新的工具和技术是外来族群迁徙带来的,具体而言,是当时滇人和汉人移民带来的。

(一) 滇人的迁徙和影响

战国至西汉时期正是以滇池区域为中心的滇文化飞速发展和鼎盛的时候^[21](P209)。滇文化的器物,包括农业工具和相应的生产技术,随着滇人向东流动和迁徙,扩散至贵州高原西部的广大地区。宋世坤先生曾经指出,贵州西部的赫章、威宁、清镇、普安等地出土的铜器,如戈、蛇头形空心扁茎剑、一字格曲刃剑、钺、铜柄铁剑、釜、贮贝器、鼓等,以及各类铜、玉石装饰品和条形砺石,都与滇文化中同类器物相似或相同。特别是滇人的青铜农具也在传播之列,贵州盘县(治今盘州市)、兴义、赫章发现和发掘的青铜锄、耒等农具都是滇文化中的常见之物^[12](P182-183)。

上述铜器和玉石饰物等是独属于滇人的文化因素,它们在贵州高原西部广泛出现,表明滇人已迁徙至此。北盘江流域的普安铜鼓山出土的铜耒、盘县和兴义等地采集到的铜锄、铜耒,说明这里也有滇人到来。由于滇人有独特的生产工具,掌握了锄耕方式,当地土著族群受到他们的影响,学会了使用滇人的铜锄、铜耒等翻土农具,原有的刀耕农业开始向着锄耕农业转变。

(二) 汉人移民及其后裔的影响

北盘江流域目前出土的滇文化器物不多,这表明当时迁入的滇人数量可能不多,主要是从西汉才开始迁入,其影响在北盘江流域尚未完全展开。从西汉中晚期开始,另一股庞大的外来族群大量涌入云贵高原。北盘江两岸的族群又受到了他们的影响,这就是来自中原、巴蜀等汉文化区域的汉人移民。

西汉中叶汉王朝在云贵高原普遍设立郡县,招募农民开发边疆,“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2](卷30《平准书》,P1421)。大批农民在西南夷地区毁林开荒,修建城堡,开辟出一片片的据点和耕地,同时将先进的铁器农具和生产技术也一并带来。前述宣威苏家坡西汉晚期墓葬出土的铁锄和铁斧,揭示出先进铁器工具传入北盘江两岸的事实。该墓还出土了铜釜和五铢钱等汉式器物,墓主应当是一位响应政府招募

前来开荒的农民。

在西南夷地区的开发活动中地方官员带头垂范,引导农民开垦土地。如西汉末梓潼文齐在朱提(今云南昭阳区),“初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18](卷4《南中志》,P414)。王莽时期,他任益州太守时,“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22](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P2846)。由于有汉人官吏的带领和农民的辛勤劳动,云贵高原部分适宜农耕的地区出现了新兴的传统农业。前述宣威苏家坡汉墓出土的铁农具和兴义、兴仁汉墓出土的3件陶陂池稻田模型反映了汉人移民及其后裔开发当地的历史。汉人移民带来的工具和技术改变了当地农业生产的格局。

需要指出的是,汉人移民及其后裔带来的影响是有限的。传统农业并没有在云贵高原或北盘江流域普及,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往往集中分布在汉晋郡县统治中心区或主要交通干线附近的汉人聚落区,如朱提县在汉晋时期分别是犍为郡属县、犍为属国治所、朱提郡治所,苏家坡西汉晚期墓葬所在的宣威在西汉时是犍为郡属县^[23](P32、P56),兴义、兴仁汉墓群所在地位于汉代巴蜀地区通往贵州高原西南部的的主要交通干线上,也是汉晋时期宛温县中心区和兴古郡郡治^[24](P28-29)。这些地方往往是外来汉人移民及其后裔的主要聚居地,当地的农业生产自然也是以传统农业为主。而在土著族群聚集的地方,传统农业的影响力度则很有限。例如兴义老坟山墓群位于兴义万屯镇阿红盆地边缘,其时代为东汉中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品都不同于汉墓,墓主应属于土著族群。根据对墓内人骨的鉴定结果,墓主人群生前不常从事较重的劳作,可能从事放牧和渔猎之类的生计活动^[10](P177)。又如贞丰浪更燃山石板墓群,它位于北盘江岸边缓坡上,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中期,它与相邻的望谟水打田遗址出土的瓮棺葬石板墓属于同一人群墓葬。出土物有陶器、各类饰品和网坠,发掘者推测这一带居民的生计方式以渔猎为主^[25](P37-49)。这两处墓地的墓主都是土著族群,从墓葬出土情况看,他们显然没有受到汉人传统农业的影响。

三、结语

新石器时代中期到先秦时期,在漫长的时间里,北盘江流域的农业始终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发展十分缓慢。战国以后,才在工具和技术层面有了突破,特别是在汉晋南朝时期,当地出现先进的农具、耕作方式和技术。然而这些突破不是从本地农业生产中自发发展出来,而是外部族群迁徙带来的工具和技术造成的。其中,战国至西汉时期,滇人迁徙到贵州高原西部,带来滇式铜锄、铜镢等生产工具和相应的锄耕农业技术。汉晋南朝时期,汉人移民涌入云贵高原,在开发边疆的过程中,为当地农业带来先进铁器农具和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可见,包括北盘江流域在内的广大贵州高原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的两次重大变迁都与外来族群的迁入和影响有密切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滇人和汉人移民及其后裔的先进工具和技术在当地传播和影响的范围都有限。北盘江流域的土著族群并没有因为先进农业生产方式的到来而放弃原有的生计方式。汉晋南朝时期,北盘江流域的居民仍然保持了多元化的生计方式,而农业生产也呈现出原始农业与传统农业并存的格局。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仍有待探索。

注释:

①侯绍庄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夜郎地区的濮人已进入定居的农业生活。张合荣提出古夜郎时期生活在贵州高原的濮夷民族已是西南夷中种植农业的典型代表。杨勇结合随葬农具和出土炭化作物认为农业是可乐墓地土著族群的重要生产部门。周志清指出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的稻作植物遗骸反映了稻谷是当时居民的主要食物来源之一,农业是主要的生产活动。颜全己、杨军昌通过分析两汉时期贵州汉墓中铁制生产工具及陶屋、陶仓、陶井模型,认为两汉时期这一区域农业定居生活普遍形成。参见侯绍庄、史继忠、翁家烈《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9页;张合荣《贵州古代民族农业发展略论》,载《贵州民族研究》1996年第4期,第45-52页;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见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周志清《滇东黔西青铜时代的居民》,见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页;颜

全己、杨军昌《论汉代古夜郎区域的农耕稻作发展》，载《农业考古》2020年第3期，第58~65页。

②宋兆麟提出原始农具包括砍伐器、石斧、石铤等。陈文华将原始农具分为整地、收获、加工脱粒三类，石斧、石铤则是整地农具中用来砍砸森林、砍砸树根的重要工具。参见宋兆麟《我国的原始农具》，载《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第122-136页；陈文华《农业考古》（第一版），见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③鸡公山遗址中，80%的灰坑出土有炭化稻谷，经检测系人工种植，并被有意放置于坑内。吴家大坪遗址发掘发现稻谷坑，炭化稻谷数量巨大。有关珠街乡扁窟坑洞穴炭化稻遗存转引自《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参见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威宁县文管所《贵州威宁县鸡公山遗址2004年发掘简报》，载《考古》2006年第8期，第11-27页；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威宁县文管所《贵州威宁县吴家大坪商周遗址》，载《考古》2006年第8期，第28-39页；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见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④普安铜鼓山遗址自1977年起经多次发掘，详见程学忠《普安铜鼓山遗址首次试掘》，收录于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见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61-64页；刘恩元、熊水富《普安铜鼓山遗址发掘报告》，收录于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见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65-87页；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普安铜鼓山遗址》，收录于国家文物局编《2002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见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47-51页。

⑤笔者在铜鼓山及周边做田野调查时，发现当地环境适合种植水稻。这里地表起伏和缓，丘陵之间洼地土壤堆积深厚，土质肥沃，水源充足，当地农民过去多种稻谷和乌谷（薏仁米），至今仍有很多人种水稻。

⑥兴义、兴仁等地汉墓的数量丰富，材料公布分散，详见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兴义、兴仁汉墓》，载《文物》1979年第5期；贵州省考古研究所《贵州兴仁交乐汉墓发掘报告》，收录于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见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264页；张合荣《兴义万屯九号汉墓清理》，收录于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见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兴仁县交乐十九号汉墓》，载《考古》2004年第3期；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兴仁县交乐二十号汉墓清理简报》，收录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报告集（1993-2013）》，见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4-176页。

⑦关于董箐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情况参见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董箐考古发掘报告》，见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董箐田脚脚遗址调查报告》，收录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报告集（1993-2013）》，见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179页。

⑧原调查报告认为董箐遗址主体年代在东汉，但时代延续至宋明。发掘报告认为遗址年代从魏晋南朝到隋唐。根据遗址出土的石器、纹饰陶罐和陶片、青瓷器及铜器等遗物判断，该遗址使用年代虽较为久远，但主体年代应为东汉至两晋南朝时期。

[参考文献]

- [1]《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 [2](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张合荣.贵州古代农业起源初探[J].农业考古,1996(3).
- [4]曲靖地区文管所,宣威县文物普查办公室.云南宣威县尖角洞遗址调查[J].考古,1986(1).
- [5]张改课,王新金,张兴龙.贵州省贞丰县孔明河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与意义[J].贵州文史丛刊,2016(2).
- [6]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贞丰县文管所.贵州贞丰县拉它先秦时期遗址发掘简报[J].四川文物,2012(1).
- [7]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
- [8]杨六金.一个鲜为人知的族群—莽人的过去和现在[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
- [9]费孝通等.贵州苗族调查资料[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
- [10]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2013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 [11]李保伦.云南宣威市发现青铜器等文物[J].考古,1996(5).
- [12]宋世坤.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初论[C].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 1980.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 [13]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
- [14]贵州省文物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六盘水市文物局.夜郎寻根[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

- [15]张定福.贵州普安考古调查[C].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 [16](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7]程学忠.普安铜鼓山遗址首次试掘[A].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 [18](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
- [19](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0](唐)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21]彭长林.云贵高原的青铜时代[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 [2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3]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 [24]张合荣.贵州出土汉代灯具与郡县地理考察[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5).
- [25]杨洪.贵州贞丰县浪更燃山汉代石板墓[J].考古,2013(6).

责任编辑:戴方晨

《农业考古》征订启事

《农业考古》为国内外发行的双月刊,每逢双月的26号出刊。其中第1、3、4、6期内容为农业考古及相关农业历史研究,第2、5期为茶文化专号。订购本刊,有以下两条途径:

一、邮局征订

自2024年起,我刊改由南昌市邮政局总发行,欲订购,请至各地邮政局(所)订阅,邮发代号为44-156。国内定价:25元,海外定价:15.00美元。

二、北京国图书刊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联系人:杨汉辰

电话:010-69267726、18010113977

办公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金苑路15号格雷众创园B座701室

编辑部联系电话:0791-88592324

《农业考古》编辑部

2024年1月19日